

·民族文献与研究·

文苑瑰宝：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

史 金 波

1917年宁夏灵武县修城时出土两大箱西夏文文献，后辗转传藏，于1929年大部分入藏于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计百余册，蔚然成为大观，少部分藏于甘肃、宁夏，一部分流失于日本。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北部地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封建王朝，自称大夏国（1038—1227），前后共历十个皇帝，享国190年。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近邻还有回鹘、吐蕃政权。各王朝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西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夏首都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主体民族是党项羌。西夏初期创制了记录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当时称为“蕃文”，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随着西夏的灭亡而逐渐消亡，明、清以降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这样一个重要王朝的历史并未列入中国正史之中，致使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贫乏。治西夏史者逐渐感到若进一步探究西夏的历史和文化，廓清西夏王朝的真实面目，只靠中原王朝以汉文记载的有限的第二手资料还远远不够，最好能发现、利用西夏人自己记录本朝历史和文化的的第一手资料。

所幸近百年来西夏文文献不断出土，给西夏研究带来转机。

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率领的探险队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发现大批文献和文物,用40匹骆驼驮至圣彼得堡。其中以西夏文文献最多,共有数千卷册。然而这些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献长期封藏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后来虽逐渐有所披露,但绝大部分文献世人难得一见,学界难以利用,学者为此扼腕。

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周叔迦先生整理编目,以《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为题发表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上。^①笔者在黄润华先生的帮助下于1973年、1982年重新整理这些文献,发现馆藏有所变化,增加了原为俄罗斯所藏黑水城出土的21卷佛经,原有的馆藏佛经则有遗失。^②在拙著《西夏佛教史略》一书的附录中有北京图书馆所藏佛经目录。^③2002年春、夏,又与国家图书馆的王菡、全桂花、林世田同志再次对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整理,又有新的发现。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在西夏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由于西夏文字解读的成功,西夏文文献越来越受到西夏学专家们的重视。

一、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数量很多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总计20多种,有100余卷,约有数千页面。其中既有西夏时期的文献,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慈悲道场忏罪法》等;也有蒙古时期、元代的文献,如《金光明最胜王经》、《添品妙法莲华经》、《悲华经》等。其中以佛经为主,也有世俗文献,如《瓜州审案记录》、户籍、粮帐和军抄文书等。国内如宁夏、甘肃、内蒙古也陆续出土了不少西夏文文献,但国内藏西夏文文献仍以国家图书馆为首富。其中有:

1、《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此经十卷本,仅缺第二卷;

2、《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卷;

3、《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八、五十一、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七、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六、六十七、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六十九、七十、七十、七十一、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九、八十、八十。此为八十卷本《华严经》，共存六十卷，其中卷三十三、四十五、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九、七十、七十一、八十有复本。若算上甘肃、宁夏所藏以及流失到日本的此种《华严经》，八十卷庶几完备。

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第一、第三、卷四、第四、第五、第五、第五、第六、第六、第八、第九、第十、第十。《金光明经》为十卷本，缺第二、七卷，第一、四、五、六、十卷有复本；

5、《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五；

6、《悲华经》卷第九；

7、《经律异相》卷第十五；

8、《添品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9、《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八；

10、《大悲经》；

11、《大智度论》；

12、《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两卷；

13、《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

14、《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十五；

15、《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下卷；

16、《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四、七十一、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一百三、一百四、百十二、百十三、二百八十一、二百八十三、二百九

十三、二百九十四、三百五十。此《大般若经》共六百卷，俄藏西夏译本皆为前四百五十卷。国图所藏是经计二十一卷，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转入；

17、《菩萨地持经》；

18、《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19、瓜州审案记录；

20、军抄文书残页；

21、农户纳粮帐残页；

22、户籍残页；

23、汉文户籍残页；

24、汉文《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

25、汉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残页；

26、汉文禅宗著作残页。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残页。我国目前所存古代宋、元时期的版本皆是珍贵文献，总量不多，国家图书馆珍藏一百余卷西夏文文献是相当可观的。

二、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有很高的文献和文物价值

馆藏文献为西夏、元代古本，距今有七八百年的历史，皆属于宋、元时期的善本。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数量巨大，内容丰富，但从其文献的时间段来看，基本上多是西夏时期，西夏灭亡以后的文献很少。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不仅有西夏时期的，有西夏灭亡后已经确立了蒙古的统治、元朝尚未建立时期的，也有元朝时期的文献。蒙、元时期的西夏文献，反映了这一时代西夏文字使用和流行的状况和特点，也间接地折射出使用西夏文的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后裔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蒙、元时期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从这方面可以说，这些跨越几个历史时期的典籍有其特殊的文献价值。

馆藏文献中有不少属于海内外孤本，如《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经律异相》、《悲华经》等都是国内外收藏西夏文献的部门所没有的佛教经典，十分珍贵。

另有一些文献其他部门虽有收藏，但与国家图书馆所收卷次不同，或版本不同，也应属于孤本。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添品妙法莲华经》等皆属此类。总之馆藏大部分西夏文文献都是珍贵的孤本。

馆藏文献中大部分是西夏文佛经，但也有少量世俗文献；不仅有西夏文文献，也有汉文文献。不同类别的文献都有各自的价值。比如馆藏有两页瓜州审案记录，是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年间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审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真实笔录。同类的瓜州审案记录在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以及日本都分别藏有页面，用这些稀见的社会文书研究西夏的经济和司法是很有价值的。更可喜的是在最近整理馆藏西夏文献时，在一些佛经的封面、封底的衬纸中又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户籍、粮帐和军抄文书残页，这些文书为研究西夏社会、经济、军事增添了新的史料。如《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九的经背的裱糊用纸有关于户籍丁口的汉文文书残页，记载了一户有男子几口，其中成丁几口，不成丁几口，每口都有具体人名和年龄。由记载可知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为成丁。尽管寥寥数行，并不完整，但这些反映社会实际的文书可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成为了解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

上述有些佛经前有版印经图，如《慈悲道场忏罪法》前的“梁皇宝忏图”，《经律异相》、《大方广佛华严经》卷首的“释迦如来说法图”，有的布局精巧，刻工细腻；有的分解构图，类似连环画，是研究中国版刻图画艺术的重要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版画中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有的是汉传佛教的特点，有的又带有藏传佛教的色彩。版画中西夏人物的服饰，如皇帝、皇太后以及官员的穿着，国师和僧人的僧衣，男女侍者的打扮都是探讨当时服饰的珍贵素材。

国图西夏文献的纸张、封面和题签的绢绸，分别是研究古代西夏、元代纸张、丝绸质料、制作的珍贵实物资料。

三、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馆藏西夏文种类较多，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其中有几种文献对研究西夏佛教史具有重要价值。

馆藏西夏文佛经《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有发愿文，文中首先记述了佛教在东土盛行，传译佛经，三武毁佛等佛教在中原流传的基本史实后，着重记述佛教在西夏流布和译经情况，具体记载了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建国当年即开始组织译经的情况，以白法信、白智光等32人为首，历经四朝，用了53年的时间将汉文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称作“蕃大藏经”，共译362帙，812部，3579卷。后仁宗皇帝时又与南北经重校。显然这一发愿文为西夏译经史提供了关键的资料，使西夏译经事实变得清晰、具体。^④近些年来在俄罗斯所藏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陆续发现了不少西夏文和汉文发愿文及题款，使西夏佛教史的资料越加丰富，然而对西夏佛教系统而具体的总结和追述的却只有国家图书馆藏的这篇发愿文，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不难想见。

又馆藏西夏文佛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有版画《西夏译经图》，高、宽各27厘米，图中刻僧俗人物25身，有西夏文题款12条计63字，记图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上部正中跏趺而坐的高僧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即译场主译人。他斜披袈裟，讲解经文，并以手势相辅助。旁列十六人为“助译者”，其中8僧人分别有党项人或汉人名题款。图下部人身较大者，左为“母梁氏皇太后”，右为“子明盛皇帝”，为西夏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皇太后。此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面和皇太后、皇帝重视译经，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是研究西夏译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我国有漫长的译经史，不少文献详细记载了译经事实，这些记载无疑对研究译经

史,乃至研究中国佛教史十分重要。但利用形象的手段描绘译经的场面,而又保存至今的只有国家图书馆的这幅译经图。作为目前所见惟一的一幅译经图,其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都十分珍贵。^⑤

馆藏还有多卷《金光明最胜王经》,其中第一卷有序言两篇,第一篇是译自汉文的《金光明经忏悔灭罪记》,第二篇是《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十分重要。序言记载了《金光明经》流传东土后先后五次由梵文译为汉文的经过,包括译经朝代、时间、主译人、译经地点、所译卷、品数等,特别是记述了西夏时期翻译、校勘此经的经过以及在西夏倡导、传播此经的情况,指出是盛明皇帝(惠宗)时由国师白法信“译汉为番”。最后还提及西夏灭亡后此经的遭遇与序言作者的发愿。另此经卷十末尾有跋文一面,记载了刊印时间起自乙巳年,完成于丁未年。据考证为蒙古乃马真称制的十三世纪中期。^⑥不难想见,此流传序和跋对研究《金光明经》在中原地区和西夏的流传,以及考究西夏译、校经史有重要价值。

党项人在元朝为色目人,其上层有较高的地位,党项人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还有相当的保留。元朝政府在民族政策上对党项族有所照顾,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曾令于杭州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即西夏文《大藏经》。世祖去世后,于至元三十一年元成宗“罢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经》板”^⑦,后来又恢复刊印。据上述《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所载,知于大德六年(1302)刊毕。日本善福寺所藏元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刊印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有发愿文记:“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河西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永远流通。”^⑧这一记载确切地印证了元代曾雕刻全部西夏文大藏经以及其他单部西夏文佛经。近年敦煌北区发现的西夏文刻本佛经残页《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经末有一长方形压捺印记汉文

两行:“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师利塔中永远流通供养。”^⑨管主八是元代一位僧官,任松江府僧录,其名为藏文译音,意为经学大师。他主持印制西夏文大藏经,并施于敦煌佛塔中。可能在他所施经中都压捺了这样的印记。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有一页西夏文佛经,也出自敦煌,上面也盖有同样形式和内容的印记。元朝刊印的西夏文《大藏经》是何形制?过去无从知晓。在馆藏西夏文《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本母》有祝赞4面,祝赞中西夏文题款译文为“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太后皇后与天寿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悲华经》也有祝赞4面,也有同样的题款。又《添品妙法莲华经》有祝赞3面,其中题款译文为“当今皇帝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御印,正宫皇后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是元武宗和仁宗的母亲。知此经的印施当在成宗之后。馆藏上述元代西夏文佛经就是元刊本西夏文大藏经的一部分,证实了元代雕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史实,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四、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馆藏文献有写本,但更多的是印本。印本中有很多刻本,如《慈悲道场忏罪法》、《金光明最胜王经》、《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大悲经》、《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经律异相》、《添品妙法莲华经》、《悲华经》等,其中不少字体清晰,版面疏朗,刻印精致,是中古时期的优秀刻本。通过这些刻本可以研究西夏和元代的印刷情况,特别是西夏文文献的刊印事实。

国图藏西夏刻本文献中有的还记载了刻工姓名,如《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忏文第4面有汉文“何森秀刊”,卷首《梁皇宝忏图》

有“俞声刊”三字。何森秀是雕刻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忏文的刻工,俞声是雕刻《梁皇宝忏图》的刻工。

又《地藏菩萨本愿经》、《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五、《悲华经》卷第九、《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八、《大悲经》、《大智度论》都记有刻工姓名,这些刻工姓名不仅丰富了古代刻工的内容,还有助于确定版本的时代。如《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有刻工名“台周”。该经卷末有元皇庆元年(1312)西夏文发愿文。又《大悲经》的刻工中也有“台周”,尽管《大悲经》中没有记载刊印时间,也可推定其时代大致与《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同时。再有《大悲经》的刻工还有“周子俊”,而《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中也有刻工“周子俊”,也可证《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是同时代的刻本。《悲华经》卷第九是元大德十一年(1307)刻印,记有刻工姓“周”,此人可能是上述《大悲经》和《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中的刻工“周子俊”。

特别可贵的是其中几十卷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都是活字印本,具有明显的活字印刷的特点。该经不少页面中一行之内有字形歪斜现象,这是初期活字印刷时活字不规范或聚版技术不精而造成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在木雕版印刷时是不会出现的。该经有不少常用字与上下左右墨痕深浅差别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在排字过程中常用的活字用量很大,但备用不多,不够用时只好暂时空缺,后来再个别补印。在经纸背面可以看到一些印字透墨深浅不一,这也是初期活字印刷时的一种特有现象,与木雕版印刷时背面透墨比较均匀的情况迥然不同。特别是此经卷第四十有西夏文题记两行,译成汉文是:“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盛律美能慧共复愿一切随喜者,皆共成佛道。”“选字”应是拣字、排字,“选字出力者”应是拣排活字的工匠。与此同时出土的《华严经》部分流失到日本,在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此经卷第五有西夏文题记两行,译成汉文是:“都发愿令雕碎字勾管为印者都罗慧性,复共一切发愿助随喜者,皆当共成佛道。”“碎字”,即为活字。这两条西夏文题记是证实这

种《华严经》为活字本的确凿证据。^⑩此次检阅多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发现有的页面若一行空字较多,会在空字处有一花朵图案,如卷三十四、六十、六十五、六十七、七十一等都出现过。这是为印刷时支撑印纸不致在空白处塌落而做。这种现象在雕版印刷中早已存在。但若仔细辨识《大方广佛华严经》诸卷的花朵图案,会发现在不同卷次、不同页面中大小、形状完全相同,证明这种花朵图是活字印刷的。这又为推定此种佛经确实是活字印刷品增添了新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首第一行经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契”、第二行译经题款“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第三行校经题款“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卷末经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契”不是活字版,而是镶嵌在活字版中的小型雕版。因为这些字在各卷是相同的,雕刻一次可以用于各卷,特别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有八十卷之多,可以使用八十次,这确实是省工省力的方法。将各卷中相同的题款雕刻成固定的版块,加排在活字版中,在西夏时期的泥活字印刷中已经使用过。武威发现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卷首的西夏仁宗的二十字尊号题款在各卷中是不变的,因此就将其刻在一整块长条木印上,检字排版时,将整条木印置于活字版的适当位置。此木印可以在各卷反复使用。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首的雕版显示出西夏文活字印刷的初期还带有木雕版印刷的痕迹,又表明西夏人应用活字印刷时不拘泥前法,灵活机动,以方便印刷为原则,反映了西夏活字印刷的特点和水平。^⑪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省时省料、方便快捷的活字印刷术。当时的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在其著作《梦溪笔谈》中记录了这一伟大科技成果。^⑫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印刷史上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应用开创了印刷史的新纪元。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延续了近千年的时间,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起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促进世界文明的进程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然而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在中原地区都没有保存下来。在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开始使用泥活字印刷，并由泥活字发展到木活字印刷。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十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其中以国家图书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数量最大，共60卷。此外，馆藏西夏文文献中还有泥活字印刷品。目前所见到的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包括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内，都是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不仅是研究西夏印刷史的宝贵资料，也成了中国首先发明活字印刷术的确凿证据。

国图所藏文献中还有不少写本，其中以《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为主，这些写经字体各异，系出自不同抄经生之手。从文字看多数书法平常，不似印本书法的功力，但因其是七八百年的古本，也很珍贵。有的经末还记有“一遍校同”，注明抄毕后校对过一遍。在《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衬纸中还发现有泥金写经残页。在瓷青纸上以金字书写佛经一般是皇室、政府所为，纸张质优，缮写精致，比较少见，十分珍贵。

此外，由于宋元时期书籍的稀有，国图藏西夏文文献的板式、书法、装帧等也是中古时期版本研究的重要内容。

五、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有民族文字研究价值

馆藏西夏文文献的重要特色就是以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书写或印刷。西夏文的性质和汉字相同，是方块型的表意文字。西夏文仿汉字的结构和笔画创制，乍一看很像汉字，细看无一字与汉字相同。这使馆藏西夏文文献带有特殊的、甚至神秘的色彩。近代解读已经死亡的西夏文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有突出的作用。当俄罗斯所藏西夏文文献尚未公布的时候，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是专家们可以利用的主要资料。老一辈学者利用这些资料对译经文，诠释文意，做出了重要贡献。王静

如先生的成名之作《西夏研究》第一、二、三辑中的很大篇幅就是译释北京图书馆的西夏文佛经。在第一辑中有《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下卷残卷考释》、《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考释》、《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第二卷、第三卷主要是对《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至卷十作夏藏汉合璧考释。^⑬此书获得法国如莲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这批珍贵文献在西夏文的释读和西夏佛教的研究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如笔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进行翻译考释。该发愿文计6面，55行，1400余字，不仅概述了中原地区佛教发展历程，记述了西夏时期发展佛教、翻译并重校佛经的情况，还记叙了西夏灭亡后元代雕刊西夏文佛经并多次印刷的经过，不啻一篇简明的西夏佛教史和西夏文佛经的源流史。这是第一次翻译没有相应译文参考对照的长篇西夏文文献，翻译此文的过程中不仅了解了很多西夏佛教史上过去不为人知的重要资料，也通过翻译研究进一步熟悉了西夏的语法和词汇，解决了翻译中的一些难题，提高了翻译西夏文献的水平。^⑭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不愧为文苑瑰宝，其珍贵价值仍有待进一步认识，其学术内涵有待进一步开发。

注：

①《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编辑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②⑩史金波、黄润华：《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载《文献》1985年4期。

③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

④⑭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1期。

⑤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文献》1979年1期。

⑥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3期。

⑦《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⑧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二),西夏佛经。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205-211页。

⑨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3期。

⑩史金波、雅森:《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

⑪(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板印书籍条。

⑫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二、三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上接第 231 页)

⑬Dehergne, Joseph(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

⑭Lars Laamann.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Beitang Collection—Report from a Fact-finding Mission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inological Librarians*. No. 9.

⑮Matos, Manuel Cadafaz de. *Intercâmbio cultural e científico entre a Europa e a China através do livro : sécs. XVI-XVIII*. Pequim : s.n., 1995 (Portuguese)

作者工作单位:李国庆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孙利平 中国国家图书馆